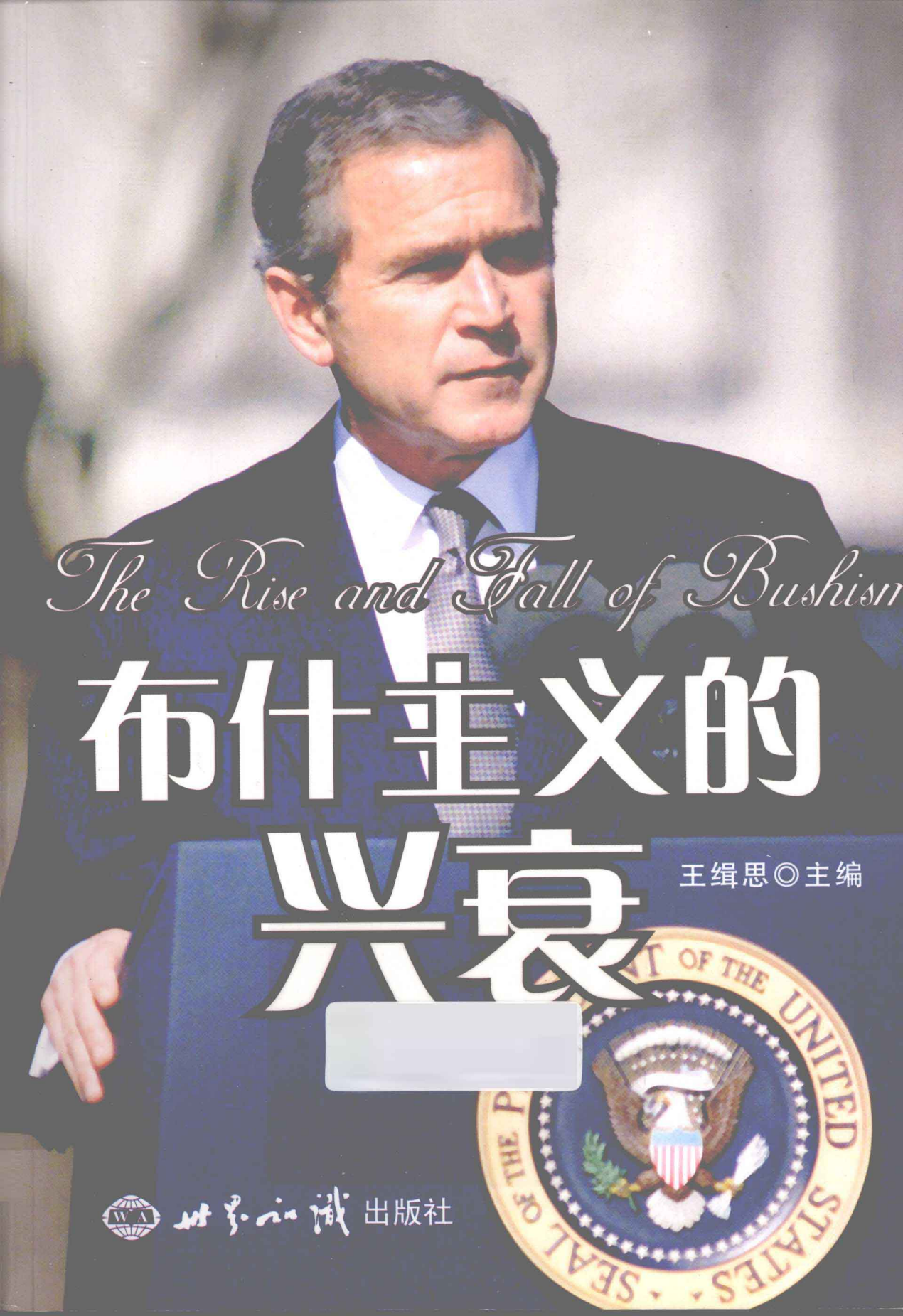


A photograph of George W. Bush speaking at a podium.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 light blue shirt, and a patterned tie. The background is blurred, show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white buil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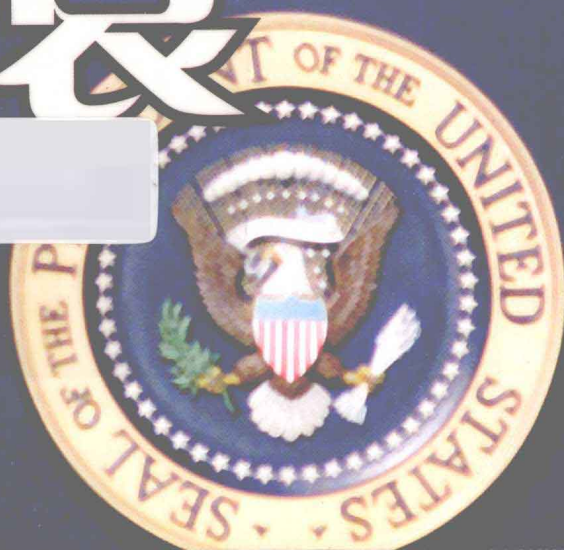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Bushism

布什主义的 兴衰

王缉思◎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

布什主义的兴衰

王缉思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什主义的兴衰/王缉思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7

ISBN 978 -7 -5012 -4312 -9

I. ①布… II. ①王… III. ①对外政策—研究—美国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7081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张 琨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书 名 布什主义的兴衰
Bushì Zhuyì De Xingshuai

主 编 王缉思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京联新技术照排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 × 1020 毫米 1/16 23½ 印张

字 数 3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7 -5012 -4312 -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与布什主义	1
第一章	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	22
第一节	孤立主义战略	32
第二节	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	35
第三节	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与冷战战略	41
第四节	不确定的过渡	46
第二章	布什主义的战略内涵	50
第一节	布什主义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53
第二节	从“制度霸权”走向“新帝国”	66
第三章	布什主义的战略实践	75
第一节	布什主义在反恐战争中全面展开	75
第二节	布什主义的调整、修补和“善后”	96
第四章	“9·11”事件对美国社会心理的冲击	114
第一节	冲击：“狼真的来了！”	114
第二节	悬疑：“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124
第三节	反思：“都是极端主义、专制主义惹的祸！”	127
第四节	回应：“没有他们的民主，就没有我们的安全！”	128
第五章	布什主义与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趋势	131
第一节	党派政治极化	131
第二节	意识形态极化	134
第三节	“新帝王般的总统”：战时总统的强势地位	136
第四节	选举政治的周期律：“钟摆开始往回摆！”	139
第五节	国内政治与大战略	140

第六章 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潮	146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潮的主要内容	146
第二节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	150
第三节 “9·11”事件：新保守主义兴盛的历史契机	155
第四节 “火神派”的关系网：新老保守派的链接	164
第五节 兴盛：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的试验场	168
第六节 衰败：魂断伊拉克	170
第七章 布什总统的个性因素及其执政风格	173
第一节 信仰改变人生	173
第二节 本能重于理性	177
第三节 原则高于权变	179
第四节 信任、放权、承担责任的执政风格	181
第八章 布什主义与大国关系	187
第一节 跨大西洋联盟——更加巩固还是濒临瓦解？	187
第二节 以美日联盟为轴心的亚太战略——“重心东移说”的新诠释	199
第三节 美俄关系——充满矛盾的合作关系	208
第四节 美印关系——维护地区平衡的砝码	220
第九章 布什主义与穆斯林世界	231
第一节 美国对穆斯林战略中的反恐与结盟	233
第二节 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打破现状”战略	248
第三节 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推进民主战略	261
第四节 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援助与发展战略	276
第五节 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公众外交战略	287
第六节 小结	302
第十章 布什主义与中美关系	304
第一节 布什政府对华战略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304
第二节 反恐背景下中美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326
第三节 超越双边的中美全球合作	346
第四节 超越国家的中美相互依赖	358
后记	371

绪论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与布什主义

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是 2001—2008 年美国大战略的调整，主题词是“布什主义”。由于主编工作方面的原因，迟迟没有定稿。但是，正是这一时间上的推延，使我们得以见证美国大战略自 2009 年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从而对布什政府的大战略调整做出更为清晰的分析，得出更为完整的结论。本绪论试图从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连续性和调整中，探讨美国大战略和当代国际政治的规律，给本书读者一个概观和结论。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在美国国际政治学界比较标准的一个定义是：“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将其长远目标同手段相连接的进程，这一进程受促进国家利益的原则所指导，基于一种支配一切而持久的远见卓识。”^① 本书主编曾经这样概括国家大战略的内涵：“什么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国家核心利益。”^② 下文对美国大战略进行概括时，将以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为主线。

一、克林顿政府的大战略遗产

苏联作为历史上独特的一个国家，在 1991 年底寿终正寝，标志着冷战时代和两极格局的彻底终结。1989—1992 年执掌白宫的老布什政府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尚未脱离冷战轨道。从本质上说，“超越遏制”战略仍是

^① 2010 年 5 月 8—9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农工大学布什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历史与比较视角下的大战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学术研讨会，美方与会者包括对大战略问题深有研究的若干专家学者。这一大战略定义是与会中美学者经过讨论而一致接受的。原文是：“Grand strategy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a state relates long-term ends to means under the rubric of an overarching and enduring vision to adva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② 王缉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 页。

一个以军事手段为核心、以威胁为导向的冷战战略，只不过苏联从唯一的全球对手转换成了一个地区性对手，其威胁大大减轻。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是美苏冷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以美国的完全胜利为结局。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但直到他任期结束时，这一主张仍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既不能阻止德国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无法掩盖这一时期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

冷战刚结束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视为“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热衷于讨论如何建立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但是，当美国从欢庆“胜利”的喜悦中坐下来环顾四周的时候，却发现它在全球性对手消失之后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模糊不清。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形象地说：“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生活在一个形形色色的感人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倒更容易摸透。”^①他的意思是，苏联这条龙虽然没有了，但形形色色的毒蛇比龙更难发现，更难对付。美国《外交政策》主编梅恩斯在1990年断言：“冷战终结的最重要后果可能是美国对外政策机构丧失主要的组织力量和行动的原则——反共。”^②因此，美国外交失去了“定位仪”。

冷战后的第一个美国大战略，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1993—2000年）形成的。不过，直到克林顿执政结束的2000年，围绕着什么是冷战后美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对美国的主要外部威胁等问题，美国朝野仍然在进行着无休止的大辩论。这些辩论的背后，则是代表军工企业、新兴产业、农业、对外贸易、不同族裔的许多利益集团纷纷企图左右外交政策。同时，民主党政府同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之间，也不断在争夺外交主导权。因此，克林顿执政的8年，被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难以决策的时代”。

但是，不能因为失去了反苏反共的“定位仪”，就认为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没有一项大战略，而只能说美国失去了主要敌手，对它的威胁来自方方面面，而美国的政策手段也必须多种多样。克林顿总统就职后，高举“变革”

^① 转引自王缉思、徐辉：“克林顿的外交遗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的旗帜，在国内集中精力于经济复苏和种族融合。1993年克林顿上台时民主党的一个说法——“经济最重要，别犯傻”（It's the economy, stupid!），集中反映了他的工作重点。同时，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宗教复归的趋势，“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成为难以挑战的“政治正确性”，公民社会的作用日渐突出。与此相适应的是克林顿政府在对外事务中所强调的全球化观念。克林顿声称要制定“冷战后美国安全的新契约”，加速从“冷战轨道”向“冷战后轨道”的转变。克林顿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一项能够凝聚全民共识的战略使命，从而实现战略转变。

克林顿于1995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题为“参与和扩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结束了40多年来军事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以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为核心，促进经济繁荣、增进国家安全和向国外推广民主的新的外交使命。这一新的安全战略被简称为“经济、安全、人权三大支柱”。正如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所说，该战略希望以“扩展市场和民主”来取代“反共”共识，作为美国外交的“新使命”。^①

但是，“参与和扩展”战略既缺乏思想理论基础，也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一战”略最突出的一点，是美国不再有确定的战略对手和固定的安全威胁。各个利益集团的不同主张常使经济、安全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混乱状态。人们时而把克林顿外交称为“人权外交”，时而称为“美元外交”。1996年竞选连任之后，克林顿开始加强对外交事务的领导与协调，国家安全问题在其议事日程中的地位开始上升，而推广民主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1997年，美国对“参与和扩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将“扩展”置于“参与”之下，强调对违反民主和人权的行为既不能姑息迁就，也不能为此进行人道主义的“十字军远征”。克林顿政府注重通过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参与”达到扩展民主的目的，把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念和对外战略三者统一起来，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差别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减少目标上的矛盾和混乱，增强美国对外扩张的“合法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克林顿政府推动世贸组织的建立、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联盟功能的转变、建立各种伙伴

^① 转引自王缉思、徐辉：“克林顿的外交遗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关系等许多重大外交行动。在保持对伊拉克、伊朗、朝鲜等所谓“无赖国家”遏制的同时，缓和了同许多敌对国家的关系。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发表了其总统任期结束前最重要的一次对外政策演说。他强调：“我们必须拥抱全球化的无情逻辑”，直接而明确无误地把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并把全球化作为美国21世纪外交工作的立足点。在演说中，克林顿还指出：“尽管从本世纪之初以来，我们的生存或自由第一次不再面临压倒一切的威胁，世界各大国不再为了安全和领土而相互争斗”，但美国必须担负起领导责任，迎接一系列挑战和使命：第一，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第二，把开放、稳定的俄罗斯和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第三，保护美国免于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第四，建立一个使所有美国人民受益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第五，建立一个自由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①

这篇演说发表后一个月，美国就同其北约盟国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4月25日，在科索沃战争的高潮中，北约首脑会议通过了《联盟战略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为了捍卫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北约可以在其成员国以外地区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包括对付恐怖活动、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等一切可能危及北约安全的威胁。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的借口是南斯拉夫政府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了“种族清洗”。这场战争开创了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对非其成员的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先例。

总体来看，对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大战略可以作以下概括：（1）从理论上说，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安全、人权的“三合一”，这三者是互为补充的。例如，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服务于它的全球经济利益，而以“维护人权”为目标的科索沃战争，既打击了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的“专制”，又维护了巴尔干半岛在北约框架下的稳定。当然，三者在实践中经常相互矛盾。在一般情况下，克林顿政府把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置于大战略目标之首位。（2）美国没有将俄罗斯、中国或任何大国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主

^①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6, 1999, released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by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f the White House.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lintfps.htm>.

要外部威胁，而试图促进俄中两国分别“融入”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3) 美国视伊拉克、伊朗、朝鲜等“无赖国家”为重要的安全威胁，力图阻止这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4)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应对走私贩毒、非法移民、能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均已被提到美国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日程上来。(5) 冷战时期所形成的美欧、美日等政治军事同盟，在冷战后继续成为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支柱。(6) 克林顿政府没有明显的地缘战略重点。有人认为科索沃战争说明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中东转移到了欧洲，但后来的事实发展不能证明出现了这种转向。(7) 通过倡导和积极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国际机制，促进美国利益。

在大战略研究中，以消除现实威胁为动力的战略可称为“威胁导向型”战略，以“国家使命”驱动的战略可称为“使命导向型”战略。前者着眼于减少损失，而后者着眼于增加获利。按照预期理论的观点，人们一般倾向于为减少威胁而付出，却不愿为获利去冒险，特别是在能否获利尚不确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全球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冷战时期“威胁导向型”战略向“使命导向型”战略的转变，为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外交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框架。

克林顿政府这一“使命导向型”的大战略，是以当年美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无可挑战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基础的，也符合民主党一贯的外交思想和传统。回过头来看，克林顿执政下的美国处于历史上的全盛时期。美国享受了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曾经大幅度裁减军费（然而在执政后期开始军事扩张，更多地炫耀和诉诸武力）。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新经济”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企业创新。克林顿执政的8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失业率从1992年的7%降低到2000年的4%，通货膨胀率则控制在3%左右。联邦财政赤字在老布什执政的1992年曾创下3260亿美元的纪录，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2%。克林顿执政后，1998年首次扭亏为盈，结束了连续长达39年的赤字财政历史。到克林顿政府结束任期的2000年，美国创纪录地积累了2541亿美元的预算盈余。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的软实力也因重视多边外交和重建国际规范等原因而得到明显提升。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布什执政的8年中发生了逆转。

二、布什政府大战略调整的背景与内涵

2001年1月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标志着右倾保守势力在美国政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对克林顿的内外政策大加鞭挞，奉行全面否定克林顿的ABC（Anything But Clinton）原则。以布什本人和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等人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借“9·11”后“反恐战争”之机，扩大权力，在政府中任人唯亲，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

所谓右翼保守势力，可以分为相互部分重叠的四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聚集了巨大财富的垄断财团和企业，特别是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集团。它们从布什的减少税收、刺激经济、缩小社会福利、放松金融监管的对内政策中获益，也从促进海外投资和贸易、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获益，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板块是军工利益集团。通过政府采购大批武器装备和国内反恐支出，通过新式武器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国防政策的影响无孔不入，是美国军费和研发费用增加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国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军工集团在政府中的代言人如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十分崇尚技术、军事手段，成为横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力量。

第三个板块是宗教右翼，其主体是基督新教的右翼保守势力。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特别是在“9·11”事件的巨大冲击下，美国社会开始趋向保守，对文化多元倾向和新移民有抗拒心理，许多人希望回归传统，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基督新教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宗教右翼的复兴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宗教右翼对意识形态、政治生活、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至国会及其选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四个板块是媒体中的保守势力。过去，美国媒体被认为是自由派占优势的舆论阵地，有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力中心”之称。但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依附权贵，讨好政府，而政府操纵敲打媒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媒

体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保守势力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电视台、报纸、网站和思想库，对公众舆论加以引导，散布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和观点。

右倾保守势力大行其道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突出。在美国社会遭受“9·11”巨大冲击的背景下，“爱国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中取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对布什政府的反恐压倒一切、敌视伊斯兰世界、歧视国内穆斯林等做法表示异议，往往被视为“不爱国”甚至“背叛祖国”。“自由主义”甚至成为一个贬义词。于是，在越南战争等时期制约美国走上歧路的“纠错机制”，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中被大大削弱了。

布什政府调整大战略的国际背景，是它上台时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占有的巨大优势和超强地位。虽然“多极化”在世界上已经讲了几十年，但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仍更像单极而非多极。美国所代表的价值体系、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则尚未遇到根本挑战，而它所倡导及维系的一系列国际规范，如打击恐怖行为、防止核扩散、维护人权等，仍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虽然德国、法国、俄罗斯等诸多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它们只是坚持强调美国的战争行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程序上、法律上的认可，而不是同情或支持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或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更不是反对反恐、防扩散、民主人权等原则。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同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结盟关系依然是稳固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同德、法、俄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争吵激烈，但2006年以后美欧、美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基本上恢复到伊拉克战争以前的常态。欧盟主要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都强调欧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价值观。布什时期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明显加深，但伊斯兰国家政府同民众的对美态度大都有明显的反差，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大国同布什政府的关系仍然得以维系甚至时而得到改善。因此，在国内政治加以推动、国际社会制约无力的条件下，布什政府的大战略调整得以实施，并在其任内基本坚持下来。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布什立即表示美国将把安全战略重点放在反恐上。其后对国会的讲话中，布什发表了关于反恐战争中“非友即敌”的讲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媒体开始推出“布什主义”的话题。

以后，“布什主义”得到拓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主要内涵：

（一）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压倒一切

同克林顿政府的“三大外交支柱”明显不同的是，布什政府把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9·11”后布什政府发表的一系列政策报告和领导人讲话，都深深刻上了右翼保守、单边主义、追求绝对霸权的印记。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激进主义同技术的结合”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提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制造材料的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①

把国际恐怖主义和所谓“邪恶轴心”挂钩，是布什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2002年1月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指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构成世界上的“邪恶轴心”。他说，“事实证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与试图开发或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是同样一些国家”，而且“它们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让他们得到发泄仇恨的手段”。^②这样，布什政府就明确地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邪恶国家”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提出要防止它们“联姻”。美国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后，又把防止核扩散的目标锁定在伊朗和朝鲜两个国家身上。

（二）重归“威胁导向性战略”，视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

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政府不界定主要安全威胁的“使命导向型战略”，而明确地将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视为主要敌手。“美国面临着长期且不断升级的恐怖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伊斯兰暴力恐怖组织和团体。”^③为了对付这一长期威胁，布什政府企图通过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建”，在中东地区推动“民主化”，以“改造”伊斯兰国家。但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并非搞垮伊斯兰国家，因为它认识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最佳也是最持久的办法，就是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与当地的政权和组织合作，或通过它们

①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2/nssl.html>.

②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2/nssl.html>.

③ 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国家战略》（2007年10月），杨晖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2005—2008年），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

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①

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试图调解巴以矛盾，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其过分偏袒以色列的态度使这种努力归于完全失败。美国早已在阿拉伯世界丧失了作为调解者的信誉。美国通过调停巴以冲突来改造“大中东”的设想，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布什的第二任期结束之前，美国的反恐战争重点已经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势力在这两个国家日益活跃。据信本·拉登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策划反美恐怖活动，成为反美激进势力的精神领袖。许多国际反恐专家认为，“基地”组织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发展成为许多人自愿参加、无须领导中心便可随时对西方发动袭击的一场长期的运动。

同时，伊朗是布什政府眼中的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代表国家。美国怀疑伊朗不但自己研制核武器，而且会向国际恐怖组织提供核技术或核材料，指称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在布什任内，美伊关系处于僵持不下的敌对状态。

（三）重视大国协调，试图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

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的概念，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

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平衡概念，主要是指在各个强权之间，通过实力较量、纵横捭阖形成的一种均势状态，或者追求这种状态的一种政策，以图维持和平与秩序。布什政府提出的权力平衡概念，是把“握有无可匹敌力量”的美国摆在这种平衡之外，即美国要高高在上，自己不需要受别国的制约，而其他国家必须受制于美国，并且它们之间还要相互制约。

美国在大国间玩的这种“平衡游戏”，具体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要同时和中、俄、印、日、欧盟国家拉近关系，目的是不让这些国家之间任何一对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大国结成反美联盟的情况。二是在地区内部形成各国相互制约的局面，例如，企图让日本、中国、韩国和朝鲜在东北亚互相制衡，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相互制衡，让欧洲国家中独立色彩较强的法国、德国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

^① 美国国防部：《国家防务战略报告》（2008年1月），杨晖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2005—2008年），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布什主义的兴衰

英国、意大利相互制衡，美国从中渔利。虽不能说“权力平衡”思想里不包含美国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以共同维持国际秩序的含义，但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处于超强地位的谋略，是企图把别的国家当成砝码，由它去摆平，搞的是“单极霸权稳定论”，或者叫“美国强权治下的和平”。

（四）扩大美国军事优势，企图达到“绝对安全”

布什政府将反恐为中心的安全利益设为大战略的核心，决定了它谋求扩大军事优势的政策。同军工有关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政策的影响增加，反过来又促使美国安全战略向更强调军事力量的方向转变。在新武器的研发和购置、新的海外军事部署（如在中亚）、电子战等新的作战手段等方面，美国也加快了步伐。美国增强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有：

——大幅度增加军费。布什政府的 2003 年军事预算增加到了 3790 亿美元，是 1983 年之后军费的最大增幅。到 2006 年，美国军费几乎达到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

——调整核战略和海外军事部署，加快军队转型的步伐。美国在东亚、西欧等地区的驻军进行了重新部署，撤出一些地面部队，以加强其机动性和从海上发动进攻的能力。这种军事部署调整将美国军队从应付单一的、确定的威胁转向应付多样化的、不确定的威胁；从扼守冲突易发的地缘要地转向着眼于全球各类冲突的全面部署；从之前的在欧洲、东亚集中布防转向针对从西半球经由非洲和中东延伸至亚洲的“不稳定弧”；从驻扎重兵的单一基地为主转向根据需要的多种类型军事基地。

——退出束缚其手脚的“反导条约”，继续推行导弹防御计划的实验和实施。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理由，限制其他国家发展军备。

——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并不说明说美国要放弃冷战时期形成的针对大国的威慑战略。布什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指出了两种“先发制人”的对象：一种是非国家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另一种是反美的所谓“无赖国家”。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先发制人”战略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五）单边主义特点显露，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情绪抬头

同克林顿政府频频签署多边国际协议、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的记录相比，布什外交的显著特点是单边主义，一意孤行。布什政府多次表示，“国

际社会不能妨碍美国单独行动的自由”。在国际裁军和军控领域，美国退出了《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退出了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冻结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拒绝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协定的谈判。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就退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在反恐领域，美国有意将其盟友的作用边缘化。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美国更是不顾多数盟友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执意而为。布什政府对联合国态度冷漠，只视其为将美国行为“正名”与合法化的工具。

布什执政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南北关系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摩擦，经济全球化遇到了一定挫折。美国外贸逆差扩大，失业现象严重，于是就寻找替罪羊，指控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倾销”劳动密集型产品，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对外贸易的保护政策和措施也更加严厉。与此同时，出于国土安全的需要和对国内民族凝聚力的担心，美国的移民政策也进一步收紧，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力度下降。大量拉美新移民涌入后，美国社会族群比例失衡，传统主流社会对新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排斥情绪上升。

三、布什大战略的成败得失

回顾布什时代，人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国霸权开始从顶峰跌落的林林总总的征兆；所听到的，往往是对美国大战略失误的方方面面的指摘。但是，平心而论，布什政府的大战略调整并非乏善可陈。归纳起来，布什大战略的成功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基本保障。如果说反恐代价十分高昂的话，它毕竟换得了美国免于遭受另一次骇人的恐怖袭击。“9·11”之后到布什任期结束，前后7年，“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势力在英国、西班牙、印尼、俄罗斯等国制造了多起大惨案，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其他国家的恐怖活动更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美国却没有发生重大恐怖事件。国际恐怖组织不以美国为首选袭击目标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美国未再发生重大恐怖事件应当说是其情报搜集成功、防范措施得力、社会内聚力强大的结果，其中也有美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协调能力较强的因素。

其次，布什政府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目标的国际安全战略，得到了世

界主要大国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支持。2001年10月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获得北约的大力协助，在国际社会也得到广泛认可。美国同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矛盾在伊拉克战争开始时趋于激烈，但布什政府利用了欧洲国家的内部矛盾，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多数东欧国家支持美国武力进攻伊拉克。布什政府的大国均势战略取得了有限成功。至少可以说，美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一般来说比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美俄关系基本稳定，只是在2008年8月俄罗斯同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时才凸显矛盾。中美关系因2001年4月南海军机相撞事件而一度紧张，但此后一直没有发生严重危机。2003年底，鲍威尔国务卿和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分别发表讲话，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05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美两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布什政府认为陈水扁当局的“台独”活动干扰了它的反恐大局，视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使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第一次明确发现了并行不悖的利益。

第三，美国的军事优势通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得到了确认。在两场战争之前，国际评论家都对美国能否迅速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表示强烈怀疑。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之下，萨达姆政权之不堪一击、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证实了布什政府事前对伊拉克政治局势不稳和萨达姆政权民心丧尽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得手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得以强化，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挤进了它一直想挤进的中亚等地区；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进一步得到加强。美国军事优势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大中东地区，美国的政治发言权远远超过了其欧洲盟国和俄罗斯。对于伊朗、朝鲜等国来说，阿富汗、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至少在短期内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2003年12月，经过与美国和英国近一年的秘密谈判，卡扎菲宣布放弃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接受国际社会的武器核查，美国同利比亚的关系开始解冻。很难想象利比亚在反恐战争之前会做出如此姿态。

但是，同布什大战略的成功之处相比，它给美国利益和威望所带来的长远损失要大得多。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它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空前的国际孤立，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大多数国家的明确反